

## 民意调查与中国政体韧性的五大“意外”发现

唐文方

苏联东欧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变革，使得西方学者和政界对中国的关注点转向了“民主化”，他们认为，只有中国的变化才能表明历史的真正“终结”。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强势，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不得不转向了中国政体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的韧性。

以往学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都是秉持精英政治的视角，他们或是从《人民日报》用词的细微变化或是通过照片上领导人的排序来预测政策走向与人事变动，这一研究取向今天仍然很重要，但民意研究的兴起对中国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开始后，中国领导人和学者越来越重视搜集民众意见的科学数据。1987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第一次对城市人口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是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领导的智库。当时领导人交待该研究机构要通过一年两次的调查，跟踪监测在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中国城市民众的心里承受能力。在80年代的最后三年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先后进行了6次调查，其学术负责人杨冠三通过数据发现，民众对通货膨胀、失业率、社会风气和政府低效越来越不满。

In early 1989, Yang Guansan wrote a top secret internal report to Zhao Ziyang, showing the survey results and warning him the danger of urban unrest. It was too late. The massive urban protests began in April that year. Zhao and the other leader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ver had the time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 dissatisfaction. When the protests were cracked down and when Zhao Ziyang was stripped off all of his titles, Yang Guansan's report was found on Zhao Ziyang's desk. An investigation followed and Yang Guansan was found guilty of instigating the urban riots. He was immediately arrested and jailed at Qin Cheng Prison, the place for the highest level political prisoners such as the Gang of Four.

在1991年到1992年间，体改所的调查又进行了两次，其中1992年的调查首次采用了美国社会综合调查中的一些题目，使得中国社会调查第一次有了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的可比性。此后由于主持人放弃学业转投商海，民意调查陷入了短暂地沉寂。

在90年代中期后，民意调查再次在中国兴起。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编者注：其统计学研究享誉世界）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政治科学家——沈明明教授回到北京大学，担任了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领导职务。自此以后，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了广泛合作，进行了大量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代表性的有1999年六城市调查、2004年的法治调查、2008年的中国调查、第4、5、6届世界价值观调查、2013-2015的中国城市调查、以及多项地方性调查等。

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最大的贡献是在2004年进行的法治调查中，其主持人沈明明

教授与时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的李磊教授（Pierre Landry，编者注：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首次采用空间抽样（spatial sampling）的方法。要知道，传统的抽样方法要借助户口登记，经常存在不全面、不准确以及需要向主管部门申请许可、沟通困难的劣势。以 GPS（地理信息）为基础的空间抽样则可以避免这些困难并且更容易更准确地采集到当地居民，特别是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种外来人口高达 30%-50% 的特大城市具有独特的研究优势。自此以后，空间抽样成为中国学术界在抽取全国代表性样本必不可少的操作环节，这些样本成为研究中国政体韧性的的重要依据。

在上世纪 90 年代，社会调查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政府许可并资助了一些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诸如中山大学主持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以及与海外学术界合作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和中国收入不平等调查等等。这些调查都借用了国际学术界既有的调查题目。如今这些调查在问卷设计、抽样、调查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等层面都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比高下，并且这些数据都可以通过申请来做研究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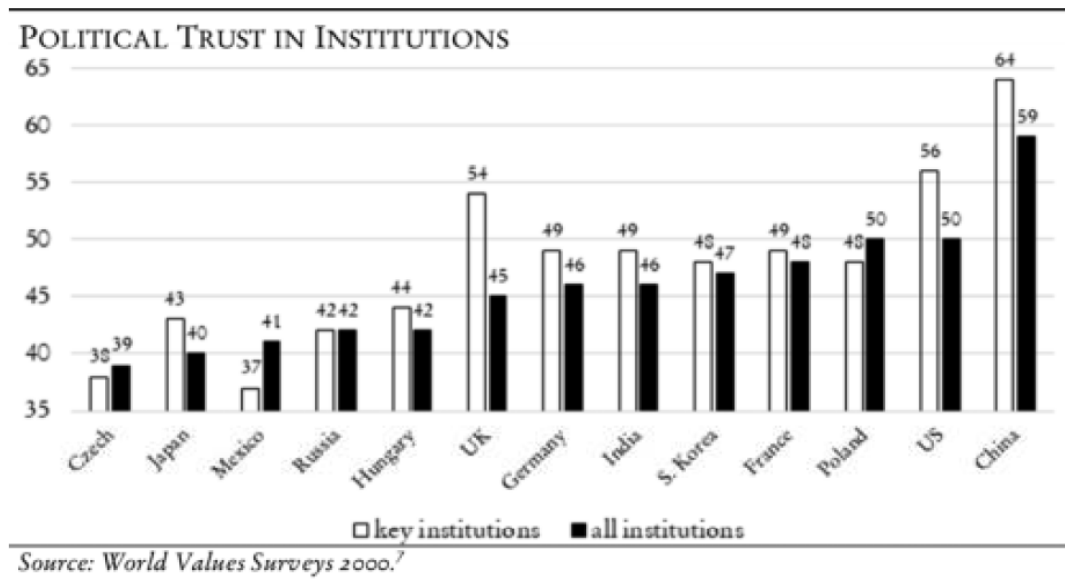
民意研究对中国政体韧性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研究挑战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信奉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意外”发现：

1. 八十年代末的社会不稳定并不是民主化的前兆，从体改委的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超过 50% 民众认为改革的速度过快，超过 90% 的受访者对通胀的担忧引起了对改革抵制的情绪。与此同时，民众对西式民主并不是太关心，从未超过三分之一，这些发现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政体韧性的社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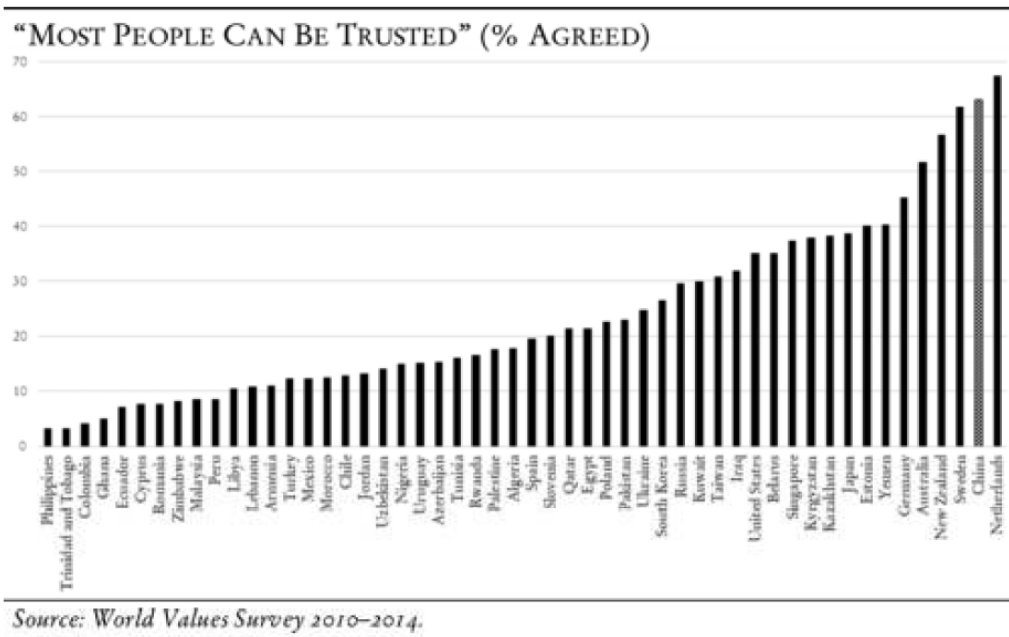


2. 政体支持。中国民意调查最重要的发现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度居高不下，无论调查者从哪个角度提问，包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对执政

党的信任”、“对中央领导人的信任”、“对核心政治机构的信心”、“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拥护”、“对中央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以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等。到目前为止的多项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政权具有很高的政治支持度。然而，这一发现经常会受到“政治敏感”的质疑，这一观点认为受访者基于种种压力不会做出真实的回答。作者指出，这一观点在改革开放前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当下可能显得有些过时。因为 Gary King、Jennifer Pan 以及 Margert Roberts 三人最近通过对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发现当局容忍一定程度的批判，只要这些批判不转化为集体行动。此外，列表实验（List Experiment）这一方法也被用于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8%-10% 的受访者隐藏了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在去除了这些隐藏偏好后，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仍然位居世界前列，甚至超过了西式民主国家的水平，这无疑对中国的政体韧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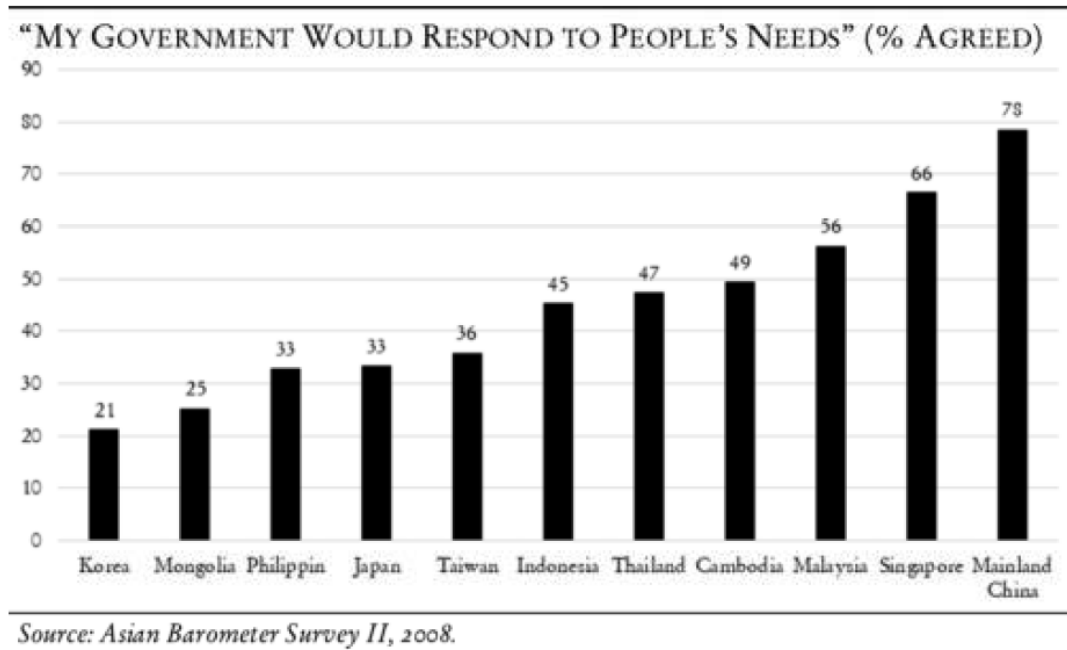
3. 人际信任。这是关于中国研究第三大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因为在过去 20 年，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比如，根据第 6 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有 60% 的中国民众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仅次于荷兰的 62%，高居世界第 2 位。相反，公认的美国、台湾、日本、韩国等民主社会对此类问题的赞同仅有 30% 左右。这一发现与传统的民主化理论相悖，因为经典的民主化研究认为较高的人际信任与社会资本才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人际信任越高，政治支持度也就越高，因此人际信任为中国的政体韧性进一步提供了社会资本。



4.政治参与。根据 2004 年的法治调查，仅有 4% 的受访者表示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选择沉默而其余人选择诉诸其他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与之类似的是，在 2012 年的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有近 5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过去 2 年里至少经历一次抗争活动。此外，人民大学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揭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对中央政府越信任的民众更愿意采取抗争。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了“依法抗争”的概念，他们认为这种抗争最终将导致民众对民主的诉求。而本文作者却认为，这种参与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它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更加信任，而不是对“民主”的诉求，因此是中国政体韧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5.政府回应性。这是中国民意调查中第五大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根据 2008 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有 77% 的中国大陆民众表示政府对他们的需求有回应，而同期的中国台湾地区调查则显示只有 33% 的居民感到当局能回应他们的需求。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也比日本、菲律宾、蒙古和韩国等西式民主政体的国家高得多。此外，相比诺里斯、史天健、申道哲分别提到的经济发展绩效、媒体控制宣教以及儒家文化教化下避免挑战权威等影响因素，政府回应性在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中扮演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从统计学上看，在同一回归模型中，当分别加入经济绩效、媒体控制、政治文化以及政府回应性四大变量时，政府回应性的作用最显著。但是这一结论也面临着挑战，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民众本身的期待值比较低，当政府做出一点点回应之后他们就会“感恩戴德”。而西方社会中，政府对民众的回应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民众也会变得越来越乖张，索取更多的东西甚至变得“贪得无厌”。这一观点有其道理，但却忽视了民意的重要性，因为对政府回应性的评价是任何政府所希望得到的政治商品，而不管政府实际上作出了多少回应。此外，民主社会中的候选人在选举时对民众的需求有着较高的回应，但是一旦他们当选就会减少这种回应。对中国而言，虽然缺少竞争性选举，但是执政党努力践行“三个代表”这一政治理想，对抗议和不满者会有所回应。对此，童燕齐、雷少华解释道，中国政府会对抗议者和上访者提供大

量补偿来维持社会稳定。因此，政府回应度是中国政体韧性的第五个原因。



总之，中国民意调查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发现挑战了西方政治学的一些经典理论，正如前文提及的五大“意外发现”。但是中国政治的研究仍然面临着几大困境：一方面，中国研究的数据越来越多，研究者在统计方法上的训练也越来越精，但是中国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理论缺乏有力的衔接。西方对“民主—威权”的二分正在限制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西方有关“民主”的“客观”划分与调查数据中民众对民主的主观感知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西方民众对民主的主观感受显著低于他们国家的“客观民主”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学者有时候过于强调中国中心主义，比如单纯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这种做法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乃至话语对话；最后一个障碍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比如有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经常会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他们的价值判断阻碍了他们对中国政治体系运作有效性与否的客观评价。本文作者认为，中国经验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不应当是一个“特例”，而应当成为“新常态”，这需要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

注：本文的英文请见：Wenfang Tang, The “Surprise”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China, *American Affairs*, Vol.2, No.1(Spring 2018), pp.101-117 , [https://www.tangwenfang.org/uploads/8/6/7/7/86775888/tang\\_2018\\_american\\_affairs.pdf](https://www.tangwenfang.org/uploads/8/6/7/7/86775888/tang_2018_american_affairs.pdf) , 中文原载于《政文观止》，2018年2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OHD\\_LdQXur0-PR2J7IHg](https://mp.weixin.qq.com/s/OHD_LdQXur0-PR2J7IHg)

读者评论：

《政文观止》读者宋团伟 建议专门对中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做两次类似的社会调查，估计

结论会有很大的不同。

《政文观止》编辑部回复：民意调查是经过科学抽样的，选择的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至于您的认为，我们不做评论，但是建议您向学术机构申请这些数据自己验证一下就好。哪个国家都有欠发达地区，可以对这些类似的地区作比较研究。

《政文观止》读者 harry 问卷只调查言不调查行，与实情差异就可能很大。虽然言论上说大多数人是可信的，但国人行为上表明的不信任远远大于欧美日本。

《政文观止》编辑部回复：这篇文章用的是科学证据，您用的是个人印象，两者没有可比性。

《政文观止》读者 Michael 这些民意调查无论是哪方面的都不如朝鲜人民对自己政府的支持与忠诚，我们政府应该向朝鲜政府学习，关闭互联网，禁止普通民众持有手机这些让我们的民意调查得到更大的提升。

《政文观止》编辑部回复：阁下好像忘了这篇文章中的第四条，中国人高度的抗争性政治参与，不知道朝鲜是否也有？

知乎网读者评论 (<https://www.zhihu.com/collection/223478939>, 3/14/2018)

程辉 被知乎管理员搞得现在每看一篇文章都像是整治隐喻了。。。

SomethingWrong 回复 程辉 等等，难道这篇不是？！

杜云 回复 SomethingWrong 当然不是

知乎用户 说得很好

luca 其实他们跟我父辈祖辈聊聊就知道为什么这么有韧性了

古老的东方一头熊 确实有点反直观，也可能我这个人属于文中所说比较“乖张”的那一类。

古老的东方一头熊 其中有关政府回应率的内容，近年以来确实回应率很高，因为群众来电是要求必须回复的，尽管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解决。只是 2008 年的时候就有这么高确实出乎意料，当时对来电来访还是能搪塞就搪塞的状态。

Manolo 回复 古老的东方一头熊 其实也没有那么反直观。之前看一些微观调查数据，也有类似的感觉（比如信任这个话题，最新的微观调查出来的结果差不多中国人，都有哪些特质？——来自世界偏好调查的证据），但自己的感受远没有唐教授这篇文章系统、深入。可是还是要多看多跑多调查。

古老的东方一头熊 回复 Manolo 信任的情况也确实还不错，人们对于身边人通常

还是比较信任的，完全的陌生人通常也不会打什么交到了，谈不上信不信任。另外我相信法治的发展对信任的加强是有帮助的，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论文？中外都可以介绍下。

[Manolo](#) 回复 [古老的东方一头熊](#) 这一块我不熟诶，要不您去开一个问题，邀请那些专门做着一块的来答吧。

[古老的东方一头熊](#) 这……不知道应该邀谁（汗）

[Allen Huang](#) 回复 [古老的东方一头熊](#) 陌生人的信任大概是“问路”、“求助”之类的吧，当遇到完全陌生人有提出需求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单纯的认为他们需求帮助，而不是以此为幌子怀有其他目的，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会对碰瓷与诈骗以及谣言这类诚信问题报以极大的愤慨，因为这都是消费人际的信任与挑战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也就是“败坏的社会风气”，比较出名的就是老年人碰瓷与孕妇欺骗少女致其死亡，使人际的冷漠又加深了一层

知乎用户 回复 [古老的东方一头熊](#) 英文可以搜索 china political trust，中文就是政治信任

[swz123](#) 希望政治周期延长不会使一切变糟。

[梁炫龙](#) 回复 [swz123](#) 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生错误的时候得不到纠正,如果任期延长了，但是纠正错误的机制也确立起来，那就没什么问题。

知乎用户 回复 [swz123](#) 有点害怕

[李玄枝](#) 这研究好厉害，是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呀。

[阵毕](#) 哪有什么真与假，讲真假要有基本条件

[猫命贵](#) 赵日天事件，一个艰难的决定，70 码，我爸是李刚，温州炒房团，莆田系医院，一个小目标，别在自行车上哭泣，钱宝自首，假药停吹 B，国足爱不起……如果是一本书，那满满都是对资本的失望，历史上来看，社会问题越多，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

[熊英杰](#) 回复 [猫命贵](#) 你说的问题要是追根溯源，都跟“强大的中央”脱不了干系

[张京军](#) 其实，只要接受中国民主程度比较高，而很多“民主国家”民主程度相对较低，这里的很多奇怪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凌云](#)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要求的所谓 民主 ，已经脱离“民主”原有的含意了。感觉像是巨婴，想要绝对的自由，有想要更多的社会，国家援助。唉…

[正常的小钢琴](#) 这也符合我的认知，zf 不管你怎么说（最多删帖封人） 它只看你怎么做 网上骂的再凶 只要不线下搞事情都可以容忍

知乎用户 回复 [正常的小钢琴](#) 骂交警被拘留…

知乎用户 回复 知乎用户 至少是赵家爪牙。另外好几个被抓的案例是在微博或微信朋友圈骂交警，没有指名道姓骂谁

知乎用户 回复 知乎用户 交警执行的是普通的道路法律法规，根本连赵摸都摸不到

知乎用户 回复 知乎用户 那你觉得怎样才算赵家爪牙？

知乎用户 回复 知乎用户 可以卖国的，有能力可以卖国的

知乎用户 回复 知乎用户 为什么要空一格？

[吴越乡人](#) 回复 [正常的小钢琴](#) 骂阿訇被跨省

[丑就读点书](#) 回复 [正常的小钢琴](#) 其实就是你骂必须“对事不对人”，你可以骂哪个官员不好，哪个政策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否定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等等。不然的话不管是线上线下都会有人找你

曜一 我承认我不敢评论

[李哲](#) 1、2点有什么可意外的，3、4、5需要原始的调查方案，这三点的内容有太强的主观性，对于数据的阐释有太大解释空间，到底怎么界定“别人”、“信任”、“抗争”、“回应”等，我认为结论过于武断和博人眼球，对于3、4、5的相关数据需要设计更详细的调查方案进行细分

[李哲](#) 还有被调查者主管预期和标准差别对于数据的影响根本就没被考虑，直接进行各国横向比较实在荒唐

知乎用户 回复 [李哲](#) 对变量定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原始数据的说明文档来看。毕竟原文只是杂志文章，不可能指望有多少细节。

[李哲](#) 回复 知乎用户 这是自然，然后对文章有点不爽，关于引用的亚洲民主生态调查的数据可以套用到其他非民主国家身上，在调查发现中中国并不特殊，普遍形成了民主与非民主对比，而且是多程度选项的问卷调查，

[Gavroche](#) 如果认真研读过《论美国的民主》《法律与革命》等，那么对于一些结论比如人际信任等可能不会太意外。

[祝昭悦](#) 回复 [Gavroche](#) 能否简要展开？



刘镇锐 我总感觉实际上是中国人要求太少，预期太低……而不是事实上中国政府确实做得比那些发达国家做到的事情更多……这和很多极权的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指数比发达国家更高是同一原因……因为这东西是人们自己评价自己的国家所产生的，而不是人们把自己的国家和别人的国家进行精细的比较之后所产生的……如果预期很低的话，当然怎么都能满足……

mjmjfk 回复 刘镇锐 这些有影响，但并不能取消该研究的意义，它的核心并不是国别比较或者政体优劣比较，而是考察政治稳定性。预期低就是容易满足，人民自我感觉回应率高就是满意度高，这些都是导向稳的，至于预期的横向比较反而对它的核心议题影响不大。

宋元楮 pierre landry 是我爸爸

宋元楮 谢谢翻译

王泮 从调查数据看而得出结论。会有种宏观和全国的视野来看待和分析数据的视角的障碍？

渣战五 实验员看着 data 不符合预期的时候扭曲的表情

唯明 好像都是十几年前的调查，21 世纪头几年可是黄金期

唯明 韧性这种东西，是不是需要考察慢变量？

知乎用户 我们父母那一代，和他们以往的生活水平相比，对现在的生活普遍是非常满意的，如果说有发愁的地方，也是愁子女结婚的事。

Snap Su 有没有一个问卷调查，调查一下中国人在填调查问卷时喜欢给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好评？

皇帝没穿衣服 调查也分对象……

骆樱 仿佛跟我待的不是一个中国

KKKKK KKK 列表实验 (List Experiment) 这一方法也被用于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8%-10% 的受访者隐藏了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列表实验”有人能解释下么？

夏诗 确实很反直观

丑就读点书 并不是预期低，而是价值观的问题，欧美的民众观念是政府是公仆，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必须服务个人。中国虽然也是国家的主人，但中国人眼中的政府是规则维护者，是公共资源的管理者，政府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天”，天地只是一种规则，神仙（官员）只是维护“天”的规则和执行天的命令（天机），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会要求政府对个人负责，政府维护好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管理好公共资源就行了，最多要求政府帮助自己，而不是政府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基督教的教义里是没有“天”这个概念的，所以民众也没这个概念，而不论耶和和耶稣都是神（神其实就是一种具有更大力量和更完美

道德的人)，既然是人，我对上帝更虔诚，上帝是不是应该对我更好一点，所以你是国家的主人，你纳税了，那么国家就应该对你更好一点。而“天”不管你恨他喜欢他，他都不会都不会特殊对待你。所以欧美认为纳税买的是服务，而且还是个人服务，中国认为纳税是用来维持规则和公共服务，并不是个人服务。对国家的理解自然差距有天壤之别，诉求也是天壤之别